

●李国文专栏●



人,自始至终,从来就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。每个人都有其长处的时候,不可避免也有其短处。有其令人敬仰的优点,亦会有其难以齿及的不足。因此,看人,透过表象看本质,要懂一点辩证法。特别对那些出现在人们身边的大师、准大师,则尤其需要一分为二,实事求是,客观准确。

不以一眚掩大德

□李国文

韩愈(768年-824年),唐宋八大家之一,生前,他并不知晓后人对他文学史上的地位,评价如此之高。苏轼在《潮州韩文公庙碑》中,起首两句“匹夫而为百世师,一言而为天下法”,便是最高的褒扬。因此,公平地看一个文人,应该保持一种“风物长宜放眼量”的尺度才好,从文学史的角度观察,轰动一时,不等于永远轰动;生前有名,不意味身后有名。苏轼距韩愈约三百年,他认为,韩愈对于中国文学重新走上阳刚的发展道路,起到了莫大的推动作用。

苏轼说,“自东汉以来,道丧文弊”的文学风气,因为他“谈笑而麾之,天下靡然从公,复归于正”。当代那些自封的,或人封的大师、准大师,别说三百年,恐怕三十年后,还能被公众记住姓名,道得其代表作的人物,已是寥寥。苏轼在这篇碑文中谈到韩愈为文之外的为人:“韩文公起布衣……文起八代之衰,而道济天下之溺,忠犯人主之怒,而勇夺三军之帅。此岂非参天地,关盛衰,浩然独存者乎?”如此推崇,如此褒扬,这才称得上历史的“公允”。到了明代,又是三五百年过去,更被学子们奉为一代宗师。于是,出现“唐宋八大家”之说。所谓“八大家”,即唐代的韩愈、柳宗元,宋代的“三苏”、欧阳修、王安石与曾巩。当时,文人茅坤、唐顺之等辈,更著书立说,力推韩愈为八大家之首。

其实,韩愈有生之年,并不顺风顺水,命运颇为坎坷。他786年赶到京师应试,六年考了三次,都名落孙山、灰头土脸。但他并不气馁,直到792年第四次应试,才得中进士。有了学历,然后求官职,又花了整整十年工夫,学了天大力气,结果碰壁撞锁,一事无成,京师居大不易,以致穷困潦倒,难以为生。他有一首诗写道:“倏忽

十六年,终朝苦寒饥。”一直到802年,苍天不负努力人,他35岁,终于得到了太学里“四门博士”的一纸聘书,总算熬出了头。

这年五月,京师的天气渐渐热了起来,太学里年轻人多,便怂恿韩愈一起去爬华山。那天,到达华山最高峰后,定睛环顾,千峰壁立,尤其住下一看,万丈深渊,顿时,韩愈头晕目眩,两腿就筛糠了。他倒未必是恐高症,俗话说,上山容易下山难,上山时,只关注脚下方寸之地,尚可勉为其难地攀登;下山时,目睹脚下踩的却是命悬一丝的生死之途,眼下深不可测,远看云雾飘渺。立刻,浑身战栗,举步维艰。于是,韩愈精神接近崩溃,后悔自己听信人言,作此登山之游。山是登上了,自料万万下不去,不由得失声痛哭起来。

李肇的《唐国史补》写道:“韩愈好奇,与客登山绝顶,度不可返,乃作遗书,发狂恸哭,华阴令百计取之,乃下。”李肇,唐人,当系史官。史官对同朝的人和事,下笔无不慎之又慎,因此,可信度极高。不过,韩愈这次出丑,并无碍于他领衔唐宋八大家,成为文化巨人。这就是古语所云:“金无足赤,人无完人。”

后来传世的韩愈肖像,很是庄严肃穆,据北宋文人陶谷考证,诸位弄错了,那是南唐韩熙载的画像。但一位正经八百的圣人,突然惶恐惊悚,涕泗横流,真是很难想象这两张叠加起来的面孔,究竟会是什么样子。

人,自始至终,从来就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。每个人都有其长处的时候,不可避免也有其短处。有其令人敬仰的优点,亦会有其难以齿及的不足。因此,看人,透过表象看本质,要懂一点辩证法。特别对那些出现在人们身边的大师、准大师,则尤其需要一分为二,实事求是,客观准确。

其实,韩愈一生,为人师表,绝对当之无愧,他不但改变了自东汉三国以来,经过魏晋、南北朝直至唐代的绮丽文风,享有“百代文宗”的美誉;而且,入朝为官,以敢言直谏著称,尤其是他的一身正气,面对逆流压迫,威武不屈,直陈己见,他的勇气和斗志,赢得朝野尊重。

元和年间,唐宪宗大张旗鼓地“佞佛”,迎佛骨至长安,闹得京师上下,乌烟瘴气。于是,韩愈上书进谏,结果可想而知,龙颜大怒,要处以极刑。不过,唐宪宗李纯,在唐代诸帝中,还算英明。仔细寻思,杀一名犯颜直谏的臣下,在史册上总是要留下不体面的一笔,随即,改变主意,将他充军发配到广东潮州,予以惩罚。这就是他那首名诗:“一封朝奏九重天,夕贬潮州路八千……”

唐代的潮州,可非当下的潮汕地区,称得上蛮荒异域。韩愈并未因遭贬岭南而意志消沉,更未因南疆偏远加之愚昧落后而自怨自艾。主潮三年,他兴修水利,引进中原地区的农耕方式,提高当地农业生产,让老百姓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;他为除害,根绝溯江而上为害一方的鳄鱼,从而人畜平安,使老百姓得以安居乐业;他兴办学校,提倡文明,循循善诱,给老百姓良好的受教育机会。这样,倒不是韩愈改变了潮州,而是潮州因韩愈的努力在变化着自己,仅三年工夫,潮州的文明程度居然达到了中原水平。

直到北宋咸平二年,潮州在当地笔架山建成韩文公祠,以褒扬他对潮州的贡献,这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纪念韩愈的祠宇。一千多年过去,回首唐人李肇在《唐国史补》里提到韩愈在华山极顶的糗事,不禁想起《左传》里秦伯所言:“不以一眚掩大德。”这才是认识、判断一个人的最佳方式。

红色的土地

□韩进勇

2021年4月18日,春和景明。踏着遍地春光,我们去采访一个村庄。大地草木蓬勃,欣欣向荣,道路两旁,时有鸟鹊飞鸣。然而我们却心灰意冷,表情肃穆。此行我们是去追寻先辈的足迹,祭拜烈士的英灵。

说来惭愧,作为当地一名老宣传工作者,中学时代还曾在村里参加过支农劳动,却不知道这个村庄竟有这样悲壮的历史。直到最近,参与编写一部当地文史方面的书籍,才了解到这个冀东大地上的普通村落——滦南县吴庄村,竟然是这样一块红色的土地,英雄的村庄。仅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有19个年轻的生命拼死杀敌,壮烈牺牲。他们有的战死他乡,也有的就倒在家乡的泥土里,年轻的热血洒在家乡的泥土里。这是一个为冀东抗日作出巨大贡献的村庄。

吴紫阳,本是一名富家子弟,家里在哈尔滨有不小的产业,1919年考入南开大学工程系,1926年在天津永定河工程处办公室工作,可谓青年才俊,前途无量。然而,他心系国家安危,同情百姓疾苦,痛恨日本强盗,长期投身为国家为民族救亡图存的行动。1938年7月,他在家乡组织起800多人的队伍,参加了冀东抗日大暴动,其率领的队伍十天之内发展到2000多人,被编为华北抗日联军第十四总队,吴紫阳任总队长。1940年10月,身为京西抗日纵队司令部参谋(水)派(县)联合县长的吴紫阳,在部队遭受日军大规模围剿的情况下,为掩护同志和群众撤离,率领少数战士引开敌人,拼死战斗。因寡不敌众,负伤被俘。敌人查出吴紫阳的身份后,企图从他的口中得到我军的情报。先是百般诱降,吴紫阳严辞拒绝;又严刑拷打,吴紫阳宁死不屈。最终,惨无人道的敌人,竟将吴紫阳和四名战士一起活埋。在良乡境内。牺牲前不久,吴紫阳加入了党组织,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,实现了人生的跨越。吴紫阳牺牲时年仅42岁,然而在吴庄村抗日烈士中他的年龄最大,村里有13个烈士年龄在25岁以下,其中两名刚刚18岁。

最为悲壮、最为惨烈的人物,当数18岁的姑娘吴建华。1944年晚秋,吴建华所在部队夜间突围,吴建华挺身而出,率领一班人冲出村庄,引开敌人。就在吴庄村边的河岸边,吴建华中弹身亡。第二天一早,敌人发现令他们上当的竟然是这样一个年轻的姑娘,丧尽天良的日本强盗放出狼狗咬烂了吴建华的尸体。带领女儿走上革命道路的父亲吴泰兴,把痛失女儿的悲愤化作战斗的力量,拼杀敌寇,半年后在卢龙县英勇牺牲……初闻英雄父女壮举,不禁令人心灵颤抖,热泪长流。3个月后,我约两位当地作家专程拜访这悲壮的土地,英雄的村庄。

吴庄村坐落在广阔的沙土地上,远离繁华,至今保持着纯朴的村风。在村干部的召集下,几位烈士亲属早早就等待着他们。他们最小的也已经73岁,一张张饱经沧桑的脸像一片片朴实的土地。吴紫阳的孙子吴武平,吴建华的弟弟吴善民都在其中。79岁的善民老人平静寡言,关于牺牲的家人和家事,老人似乎并不愿意过多讲述。吴武平老人却记忆超强,热情健谈,不仅介绍了他爷爷吴紫阳的情况,还和其他在座的老乡一起讲述了吴建华的事迹。

吴建华的父亲吴泰兴,是位私塾先生,早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女儿长大后也在他的引导下从事了革命工作。牺牲前的那天傍晚,吴建华回家看望了母亲。她没有住在家里,而是带上母亲为她准备的棉衣,悄悄回到部队宿营的村庄。那次母女相见,母亲曾劝

闺女找个婆家。女儿说只要日本鬼子侵占中国一天,咱老百姓的日子就不会安生。她安慰母亲,赶走日寇,她会找个中意的人家的。不承想才几个时辰,女儿遇难,母亲和家人遭受了撕心裂肺、永不消解的伤痛。我们本想瞻仰烈士的遗物,然而,除了吴紫阳留有一枚手章和亲手画的一幅画保存在冀东烈士陵园外,其他烈士没有留下任何东西。岁月的风雨带走了他们生命的痕迹。凭吊,必须到田野,到烈士牺牲地和墓地。

吴武平老当益壮,把拉着我们的农用三轮车在田间路上开得飞快。我曾见过吴紫阳烈士的遗像,发现吴武平跟他祖父长得很像,我甚至从他的身上想象英雄当年的风采。在吴善民、吴武平的带领下,我们来到了河岸边紧挨河坝的一片墓地,由于没有标记,他们只是指给我们大概的位置。吴建华牺牲后,亲人们把血肉模糊的尸体就地掩埋。1976年那场大地震后,烈士的坟墓迁到了村子公墓。

今年春雨水较多,麦子长势旺盛,青葱的麦苗覆盖着田野,覆盖着烈士血染的土地。烈士牺牲已经77年,但周围村庄的格局没有改变。南集村与吴庄村隔河相望,这条河叫青龙河,高高的河坝上有一条林带,几排年轻而茁壮的白杨树生机勃勃。据说这是烈士牺牲后的第三茬树木了,它们吮吸着这块英雄土地的养分,却没有见到英雄的身影。就像这块土地上的晚辈后生,生长在前辈为之奉献生命的家园,许多人却不知道烈士的名字和故事。

八千里路云和月

□大解

5月29日,由东至西横越雄安新区北外围的荣乌高速新线正式通车,这条将近73公里的智慧高速公路,开通后作为京南雄北的货运主通道,为外地车辆绕行雄安新区提供了有力支撑。

荣乌高速新线开通前夕,我有幸参加一个采访组到达施工现场,参观了部分桥梁和路段,走访了建设中的服务区。在一个施工现场,我们看到铺设沥青的工人和大型机械正在施工,全线工程都在昼夜不停地快速进展,多数工程已经接近尾声。从项目负责人的介绍中得知,这一路段全线双向8车道,路基宽度42米,沿途与5条高速公路交叉互通,有20座大桥,其中9座为特大桥,其工程质量、施工进度、智慧运行和管理,都体现了中国智慧和速度。

在采访过程中,能够感受到建设者的辛勤劳动和无私奉献精神。项目负责人介绍,从工程勘测准备到报批,从征地拆迁到施工至今,得到了交通系统和社会各相关部门的鼎力支持,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推进速度。施工期间,工程管理者们很少在夜里1时以前睡觉,而早晨6时甚至5时多就开始工作了,有的时候甚至连轴转。施工的工程师和工人更加辛劳,由于工期紧,质量要求高,工地上24小时不停顿施工,工人们轮流倒班上阵。为了加快施工进度,全线施工队伍搞了三次竞赛,每次竞赛时间100天,每一支队伍、每个人都不甘落后。正是这些可爱可敬的建设者,用智慧和汗水浇筑出了工期和质量俱佳的工程,为高速公路建设提供了新的样板,为行业创造了新的标准。更为可贵的是,整个工期内实现了安全生产零事故。

我没有赶上施工高峰期,但是从工程介绍的短片中可以看到,全线70多公里建设施工的壮观场面,令人震撼。在工地走访时,我们到达一处正在铺设沥青的路段,看到工人们正在紧张施工,大型设备有序运行,多台压路机反复碾压,滚烫的沥青使新铺

的路面冒着热气。我问身旁的一位工人师傅地面烫脚不,他抬起了一只脚,让我看他的鞋底,说,沥青在车里是190摄氏度,铺洒到地上时是160摄氏度,在新铺的路面上站时间长了,胶鞋底就会融化。他的话不多,却让我感到他们的力量非同一般。他们是专业队伍,不只是几个小时、几天、几个月,而是长年累月,从事着这种特殊的劳作。如果不是在施工现场,如果不是简单了解一些施工过程,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公路建设者们是如此辛劳。当我们坐在车里,走在高速公路旁,享受着风驰电掣的速度时,正是这些默默无闻的建设者,为我们铺平了道路。

项目负责人在介绍工程时多次提到一个词:创新。设计理念创新,管理创新,材料创新,智慧运行创新,等等。此外,还有道路美化、行车安全设计、服务区设计等,都有创新,他们把一项大工程做成了针线活儿,细致到一丝一毫,处处体现出现代化、信息

化、人性化,非常难能可贵。我常常为我们国家的路网建设而自豪。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,高速公路从无到有,高铁穿山越岭不断延伸,城市也随之拓展,一座座新城拔地而起,其建设速度和规模,可谓史诗般壮丽。中国是个古老的国家,中华民族正处于一个上升期和文明转型期,经济和社会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,人民的活跃程度和创造力,正在上演着历史周期中的一个峰值。

我生于1957年,作为农耕时代、工业时代、信息时代的亲历者,体验到了时代巨变和断层层的隆起。我的童年时期没有高速公路,铁路里程也有限,如今道路纵横,日行千里乃是常态。我问项目负责人,今后河北高速公路是否还要继续延长里程?他的回答是肯定的。他是专家,是组织者和实施者,我相信他的话。我想那些创造奇迹的人,那些辛劳而不抱怨的伟大建设者,不会停下他们的脚步。他们是新时代书写史诗的人。

江畔,那场聚会

□李秋志

1936年春,上海市的“梅兰芳公馆”,一场非同寻常的聚会。主客分别是大名鼎鼎的梅兰芳与刘宝全。一位梅派鼻祖,另一位京韵大鼓“鼓王”。二人欢聚,堪称京剧与曲艺的“峰聚”。

聚会前,梅兰芳先生专门对秘书说:“明天请刘老吃饭,一则叙旧,二来请他谈谈京韵大鼓的源流,三是请教他保护嗓子的窍门。”这次,梅兰芳既向刘宝全先生请教了从艺心得,也帮助他总结了诸多宝贵的表演经验。

民国初年,北京最热闹的地方无疑是“天桥”,清末诗人易顺鼎,曾这样形容那里的繁华景象:“酒旗戏鼓天桥市,多少游人忆不家。”盛夏之夜,人们一只手持着可口的豆汁儿,一只手拿着刚吹成的糖人儿,一边哄着孩子,一边看戏台上各类艺人的精彩表演。其间,当然少不了曲艺名家刘宝全等人。

1915年,刘宝全成立“艺曲改良杂技社”,往返于京津两地,无论天桥庙会,还是津门故里,都留下了他的铿锵鼓点与唱念做打的身影。除京韵大鼓外,刘宝全具备三大绝技——弹琵琶、唱石韵与表演马头调。他曾应邀到京剧大师谭鑫培家为寿宴助兴。那种场景实属难得,曲艺名家偶遇京剧大师,美妙的大鼓与高雅的京腔,久久回荡在京城夜空。

津门故里,堪称风雅之地。天津因漕运而生,几经沉浮,逐渐成为北方水陆交通枢纽。商贾云集,自然少不

了文人雅士与民间艺人的出没。除了杨柳青的年画、风筝与剪纸之外,天津卫绕不过泥人彩塑了。清朝末年,草根匠人张明山在传统泥塑基础上,饰以色彩和道具,形成了独特的圆塑泥人艺术。传说,慈禧太后喜欢彩塑,专门把泥人工匠召进内宫。张明山将黏土掺入棉花,调和均匀后,捏制出栩栩如生、找不空的古代人物,令慈禧连连叫好。

都市与乡村,都渴望精神文化的滋养。木偶戏,就属这样一种雅俗共赏的艺术,它源于汉,兴于唐,也叫“傀儡戏”,从元朝开始,逐渐由京城街巷发展到乡村市井。几百年来,长安街头、辽西集市与泉州庙会,都上演着相似的一幕:吆喝声中,一位民间艺人,挑着扁担,一头是小箱子,一头是演出道具,找个空旷的场地,搭个小小的舞台,围上布幔,艺人钻进去,敲锣打鼓,唱念做打,全凭一人操作。有时,还运用口技、雕绘等技巧,出神入化、惟妙惟肖的表演,深深吸引着帐外观众,很多人真想钻进布幔,“脸对脸”看个究竟。

任何国家与民族都可能派出独特的民间艺术。比如,南非草原,活跃着原始部落风格的非洲舞蹈;巴西乡村集市,到处都有拉丁舞者的身影;俄罗斯人在喜庆节日和家庭聚会上,跳欢快的踢踏舞,土耳其城堡里,反倒流行着威武雄壮的剑舞……那些与众不同的身姿、善解人意的笑容,不仅是土著的表演与梦想,更是当地人理

想生活的苦心追求。曲高和寡也好,雅俗共赏也罢,不同地域的民风与艺术,犹如波光潋滟的多瑙河,哪怕源于天涯海角,最终,也能流水淙淙,融为一体——正所谓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吧。

泰戈尔曾在《吉檀迦利》中写道:“在那里,心是无畏的,头也抬得高昂/在那里,知识是自由的/在那里,话是从真理的深处说出/在那里,心灵是受你的指引,走向那不断放宽的思想与行为。”大概声息相通吧,戴笠舒先生也曾多情地吟咏:“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/结着愁怨的姑娘。”或许,“无畏的心”与“丁香愁怨的姑娘”,正是不同国度、不同语言所培植起来的感悟和畅想吧。

独自叩门

其实,北京城的京韵大鼓、京剧,天津卫的“泥人张”“杨柳青年画”,都与非洲鼓舞、土耳其剑盾舞,殊途同归了。虽说京津秦淮、燕南塞北,很多艺术都发黄衰老了,但它们微弱的血脉,却顽强地跳动着。哪怕身处穷乡僻壤,抑或仅供瞻仰的博物馆,依旧不舍昼夜地呼吸、成长。怪不得,人们还记得,当年黄浦江畔那场快活的聚会呢。



田园熟鸣(国画)

许同印作